

实际上他是整个敕勒川共同的文化现象，早在林胡、娄烦时期，匈奴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和西亚、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有的史学家讲敕勒川是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这是有道理的。

敕勒川在古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由于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这个地方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征，极具创新进取精神。上述特征以北魏时期最为典型，标志是北魏六镇的建立。中国的民族交流进入自觉层面，是从北魏六镇设立后开始的。不同民族的戍边者在这里交融，鲜卑、汉、匈奴、羌等在这个空间里共同生存，并孕育出了一个新的文化形式，这种崭新的文化又将中华文明的进程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大同云冈石窟门口立着一块碑，碑上写着余秋雨的一句话——“盛唐从这里走出”。

各民族之间的氛围从敌对转变为融洽。就如《敕勒歌》的传唱，让斛律金唱《敕勒歌》的人叫高欢，高欢是汉人。历史记载，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欢在行军打仗时，都是用鲜卑语下命令，不是用汉语。

武川县总说从我们武川走出了多少个皇帝，这句话倒不如说成是“武川输出了多少文化”。因为盛唐开放包容文化根基就是在此奠定的。所以唐太宗说胡人也是人呐，只要我们和他好好交朋友，他们也是能说得通的。是因为唐太宗的奶奶、妈妈及周边大臣都是鲜卑人，所以他有这个观点。

敕勒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从胡服骑射到阿勒坦汗引进藏传佛教，再到民族

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践成功都发生在这里。第一批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人诞生在敕勒川，第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党支部也诞生在敕勒川。

以上叙述概而言之，就是敕勒川三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政治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孕育了特殊的文化形态；特殊的文化形态又培育了独特的区域历史，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这就启示我们，文化只有在交流、碰撞中才能够发展，才能够繁荣。固守某种传统观念，对于我们民族的繁荣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是因为各民族都为这棵大树注入了自己的智慧、活力。敕勒川文化，敕勒川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一个浓缩，要把这个浓缩研究好、解读好、对外宣传阐释好。敕勒川文化的典型性也启示我们要增强对“五个认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的认识。

土右旗在全自治区首先建立了敕勒川博物馆，我个人建议，无论在博物馆的展陈布置方面，还是在文旅产业建设方面，都应该对敕勒川文化进行深度的挖掘，用各民族甚至世界都了解的语言和方式把敕勒川的历史文化对外充分展示，这对于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都是有很大价值和意义的。

通过阅读梅岱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受到深刻启示，那就是在政治站位等方面我们应该有新的高度。从地方上的党政部门来讲，把这种思想用通俗的方法对外宣传出去，会特别有意义。